



论陈云

LUN CHENYUN

李洪峰 著

新华出版社



论陈云

LUN CHENYUN

李洪峰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陈云 / 李洪峰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5011-8384-5

I. 论… II. 李… III. 陈云 (1905~1995)—思想评论

IV. D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6429 号

论陈云

作 者: 李洪峰

责任编辑: 刘 飞

装帧设计: 王晓明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邮 编: 100040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河北高碑店市鑫昊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4.25

字 数: 28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1-8384-5

定 价: 12.00 元

本社购书热线: (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 (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 (0312) 2838225

未来属于伟大的中华民族

毛泽东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既毫不动摇地坚持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主体地位和决定作用，也实事求是地承认伟大人物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归根到底，人民是历史舞台的真正主角。有了人民的劳动和创造，有了人民的形象和声音，历史才丰富多彩、气象万千、厚重坚实、连绵不断。古今中外的任何伟人，都是在人民中生长起来的。如果不顺应人民的意愿和要求，不体现人民的意志，不依靠人民的力量，不从人民中汲取智慧和营养，伟人就会失去其光芒四射的色彩和魅力，就不成其为伟人。

艰难而伟大的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事业，造就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也造就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这样群星灿烂的领袖群体。

陈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杰出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陈云伟大光辉的一生，给全党和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留下了极其宝贵和永远值得珍重的实践财富、理论财富和精神财富。

陈云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为党和人民建立了巨大的功勋和业绩。

陈云 1905 年出生，1925 年入党，1995 年逝世。他的一生，几乎贯通了 20 世纪。20 世纪是波澜壮阔的世纪。这个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几十个国家、十几亿人口卷入战争，近亿人死于战争。这个世纪，中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开始了从百年屈辱到百年腾飞的伟大历史进程。

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说，这个世纪最重大的事件，就是中国诞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自己的先锋队，有了自己的主心骨，有了自己的坚强领导核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不但站起来了，而且必定要发展起来、强大起来。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走出了

一条具有无比光明前途的广阔胜利之路。

陈云 70 多年的革命生涯，同我们党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建立了赫赫功勋。

正如薄一波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陈云同志以及所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生平事迹，都反复说明了一个基本道理，就是艰难伟大的时势，必然产生伟大杰出的人物；人民群众的实践，永远是追求真理的人们认识、掌握和发展真理的源泉；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始终是造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精英的大学校。

陈云在谈到入党经过时写道：“入党动机显然由于罢工运动和阶级斗争之影响。此时看了《马克思主义浅说》、《资本制度浅说》，至于《共产主义 ABC》还看不懂。这些书看来它的道理比三民主义更好。罢工斗争和看了两本书就加入了党，但是我自觉入党时经过考虑，而且入党以后，自己觉得此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成家立业的一套，而是要干革命，这个人生观的改革，对我以后有极大的帮助”。“那时的确了解

了必须要改造社会，才能解放人类。这个思想对我影响很大。做店员的人，有家庭负担的人，常常在每个重要关头，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有冲突时，要不止一次的在脑筋中思想上发生矛盾。而这种矛盾的克服，必须赖于革命理论与思想，去克服个人利益的思想。比如，当我在参加革命后，资本家威胁我时，我想到吃饭问题会发生危害，但立即又想到：怕什么？手足健全的人到处去得，可以到黄埔军校，可以卖大饼油条，只要立志革命，不怕没饭吃，归根到底，只有推翻现在社会制度以后，才大家有饭吃。”（《陈云年谱》上卷，第25页）

陈云的一生，是为中国各族人民彻底解放，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顽强奋斗的伟大光辉的一生。陈云在7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堪称楷模。他始终坚持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领导革命斗争、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杰出的领导才能。他的思想和观点，集中表现在他的三卷《文

选》中。他的著作是留给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他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一贯顾全大局，坚持原则，维护团结，遵守纪律，光明磊落，谦虚谨慎。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具有注重实践、亲自动手、踏实细致、多谋善断的工作作风。他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尊重群众的创造。他爱护干部，珍惜人才，尊重知识。他艰苦朴素、克己奉公。他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望，深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崇敬和爱戴。

陈云从上个世纪 30 年代开始就担任党中央领导工作，经历了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参与了党中央在不同历史时期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多次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关键时刻、在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遵义会议上，陈云作为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四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与其他支持毛泽东的同志一起，反对当时在党内居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在关

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支持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

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几次军事指挥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1935年9月，陈云专程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10月15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作了报告，向外界介绍了毛泽东、朱德等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中共领导人。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积极参与清算党内错误路线的影响，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带头学习和阐发毛泽东思想。1942年1月1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在杨家岭举办的新年团拜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已成立20多年，经历了各种严峻考验，有成功、有失败。现在看来，最大的成绩就是我们党培养出了一个领袖，我们选择了这个领袖，他就是毛泽东同志。

“文化大革命”时期，陈云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积极参与我们党粉碎“四人帮”的决策过程和斗争。粉碎“四人帮”以后，陈云坚决支持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

的领导工作，支持邓小平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批评，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主张正确认识和评价 1976 年 4 月的天安门事件和平反冤假错案。

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同叶剑英、李先念等一起，积极支持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这次全会确立了邓小平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陈云在领导经济建设方面，是全党公认的“经济奇才、理财能手”。在经济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困难关头，人们总是希望听到陈云的意见，他也总是能够不负众望，洞悉全局，抓住要害，及时拿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从旧中国接收的是一个烂摊子。刚刚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严峻考验。在党中央领导下，陈云采取一系列灵活果断的措施，迅速稳定金融和物价，遏止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出现的长达 12 年的恶性通货

膨胀，实现了全国财经的统一，安定了人民生活。此后，在保证抗美援朝战争需要的同时，用不到3年的时间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为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做好了准备。

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陈云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重大措施。

为推进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陈云深入调查研究，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成功主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和执行，为我们党推进工业化积累了宝贵经验。

1953年，我国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供求日趋紧张，陈云果断地向党中央提出了统购统销的建议。陈云当时曾提出8个方案，权衡了利弊，供中央决策参考。这项政策实行了近30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基本商品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民经济遭遇暂时困难和“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时期，有效地保证了城乡社会主义建设的迫切需要，保证了广大人民生活的基本需

要。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陈云发挥了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陈云对如何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进行了积极探索。在党的八大上，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主张：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主体，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突破。这是陈云对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创造性贡献，实践证明，这些思想主张是正确的，影响是深远的。

陈云较早地认识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问题。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一起，领导了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制定了一系列

正确的政策措施，推动国民经济顺利恢复并实现了健康发展的新局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以其丰富的经验，主持了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他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率先研究并指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主张社会主义也必须重视市场的作用。他积极倡导和推动对经济体制进行系统改革，支持对外开放。他对关系国民经济全局和长远发展的人口、资源、环境、教育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战略性思考，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指导意见。

陈云始终高度重视党的建设。1937年至1943年，陈云连续七年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主持起草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等中央文件；发表了《论干部政策》、《共产党的基本组织原则》、《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党的支部》等重要文章，推动和促进了全党和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党的建设。这个时期，是党的建设顺利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党的队伍从4万人发展到121万人，陈云创造性地贯彻毛泽东建党思想，为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作出

了重要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建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在主持中央纪委工作的9年时间里，陈云以其远见卓识和杰出的领导才能，做了大量工作，为开创新时期纪检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坚实基础。

1979年1月，在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陈云提出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是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在陈云同志主持下，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一系列重要的党内法规，为整顿党风提供了有力武器。

1979年2月，中央纪委同中组部开始对刘少奇案件进行复查。复查结果认为，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一伙的蓄意陷害。1980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决议。之后，中央纪委还根据陈云的提议，复查了潘汉年案件，并作出了平反昭雪的决定。

1980年11月，陈云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在全党起了振聋发

贻的作用。他还强调，端正党风首要的问题是坚持、贯彻执行党章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

陈云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实事求是地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主张。他反复强调，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认为，毛泽东有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就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

陈云非常重视中青年干部的选拔和培养。他非常喜欢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名句：桐花万里关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几次题词。1981年春，召开座谈会，研究选拔各级接班人的问题。他认为，培养成千上万中青年干部，建立第一、第二、第三梯队，使党保有一支老中青结合的能够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干部队伍，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的一项战略任务。

1984年10月，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发言中，陈云提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既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也要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我们永远要坚持的奋斗目标。1985

年6月，在谈端正党风问题时又说，两个文明要一起抓。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键是搞好执政党的党风，提高共产党员的党性觉悟，坚定地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

1987年10月19日，陈云最后一次参加中央纪委全体会议。会上，对党员干部他仍然不忘谆谆告诫：“端正党风的关键是提高党员素质，尤其是提高高、中级党员领导干部素质。”（《陈云文选》第3卷，第363页）

陈云勇于追求真理，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实事求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贡献了卓越思想和智慧

陈云不但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也是伟大的战略思想家。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提出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和许多重要思想，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他的理论贡献，在经济工作、党的建设和思想方法等三个方面特别突出。

陈云关于经济工作的重要观点，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主要有：

（一）领导经济工作必须了解国情，坚持从基本国情出发。陈云认为，我们搞现代化要学习借鉴别国的经验，但无论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都没有中国的这些特殊情况，所以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不能照抄照搬。早在1956年，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关键时刻，针对有些人照搬照抄外国经验，急于过早地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忽视市场作用的情况，陈云提出应当建立一种“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即产品质量提高、品种增加、产量扩大、服务周到，从而有利于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陈云强调：“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新的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我们的国家

是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个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陈云文选》第3卷，第250页）

（二）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要真正为人民谋福利。还在激烈的抗日和解放战争时代，陈云同志就尖锐地指出：“作为一个革命家，不能只是高谈阔论，主要是工、农、兵、学、商，三百六十行，即做各种各样的实际工作。否则，就要打败仗，革命革不成，就不能生存。”“技术、经济、事务工作有其政治意义，政治工作也会带有技术、经济、事务性。”“单纯的政治工作，是没有的。”（《陈云文选》第1卷，第256页）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更加强调把经济建设放在首要地位来抓。他说：“现在全国解放了，人民民主政权建立了，如果还不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则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没有保障的”，“应该首先考虑国家的需要，也就是首先考虑如何加速国家经济建设的问题。”（《陈云文选》第2卷，第183页）他把经济建设提高到关系人民的命运和政权性质的高度来看。他说：“眼光要放在经济上。”“我们的各项工作是否搞

得好，不仅关系到四亿七千五百万人的命运，而且对全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有着重要的影响。不看清楚这些，便不可能认识我们的责任。”（《陈云文选》第2卷，第18、61页）他尖锐地指出：关系全国人民经济生活的事是第一位的大事，一定要抓紧管好，“如果我们不管，怎么能算人民的政府呢？”（陈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4号）“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管吃、穿、用，管油、盐、柴、米。不要看不起这些。”（《陈云文选》第3卷，第33页）1956年后“左”的倾向开始抬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搞阶级斗争为纲，我国社会经济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对此他十分着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他表示由衷的高兴，并立即出来主持全国经济工作，对经济调整和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陈云认为，不解决实际问题谈为人民服务，是空话一句。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如果我们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便站不稳。1959年六七

月间，毛泽东在庐山同协作区主任谈话中说：“大跃进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过去陈云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其他。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80、78页）

（三）建设规模必须与国力相适应。陈云认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陈云文选》第3卷，第52页）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搞建设，真正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这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他一再强调：“我们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香港、新加坡、南朝鲜等地区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欧美日本各国也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看到这种困难。”“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这个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

图的出发点。别的国家没有这么多人，没有这么多农民。”当西方国家指责中国穷的时候，他说：“穷，这是应该承认的”，要看到我们还很穷，“同日、德、英、法不同，工业基础不如他们，技术力量不如他们，这两点是很重要的。”看到穷，底子薄，“考虑到我国人多、地大、各地情况不一样这个事实。”（《陈云文选》第3卷，第281、250、251、86、236、31页）应该从这样的基本实际出发，制定方针政策，进行现代化建设。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把握住这一点，我们就能把握住经济建设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我们推进现代化进行就能无往而不胜，否则必然遭受挫折失败。他提出了建设规模和国力相适应的五大原则，即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略有结余；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人民购买力提高的程度要与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基建规模要考虑农业的约束力；基建规模和财力、物力间的平衡不仅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这些话，至今适用。

（四）经济建设必须注意综合平衡。陈云指出：“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离开别的部门。一部

机器，只要缺一部分配件，即使其他东西都有了，还是开不动。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他指出：国民经济“应该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全面安排。”综合平衡要从现有的经济水平出发，而不能从发展的愿望出发，而且必须“留有余地”。他提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时刻关注研究农轻重的比例，工业内部基础设施与加工工业的比例，民用工业与军用工业的比例，大厂与小厂的比例，生产与消费的比例，以及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比例，“既要研究那些已经形成的比较合理的比例关系，更重要的是研究暴露出来的矛盾”。他强调，“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陈云文选》第3卷，第211、212、56、279页），许多好事是不能一下子办到的。这一基本观点，揭示了社会发展过程中一条最重要而又易为人们所忽视的基本经济规律，不仅继承了马克思关于“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消灭，所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的思想，而且密切结合我国实际，提出“留有余地”、

“量力而行”等基本原则，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重大指导意义。陈云认为，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一定要统筹兼顾，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健康发展。按比例是客观规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实现综合平衡最重要的是做到财政、信贷、物资和外汇收支的平衡。国家的财力物力一定要用得恰当。所谓恰当，就是迟用、早用，多用、少用，先用、后用，缓用、急用的问题解决得好。建设重点只能根据全局的长远的利益，经过综合平衡来确定。他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深刻揭示了综合平衡的极端重要性。

（五）正确处理开源与节流的关系。陈云认为，所谓开源，就是发展经济。节流很重要，开源更重要。对支出用“削萝卜”的办法，对收入用“挤牛奶”的办法，在财政和经济上都会有利。

（六）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陈云一再告诫我们，我国“真正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业

问题是全国的大事”，“对于这样关系全国六亿多人民的大事，关系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是不能不关心的”。“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陈云文选》第3卷，第257、194、210、236页）之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人是要吃饭的，不能天天靠吃马列主义过活，一天不吃饭，肚子就饿得哇哇叫。”同时，“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农村能有多少剩余产品拿到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城市的规模才能搞多大。其中关键是粮食。”因此，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必须坚持“以农轻重为序，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工业不能挤农业，城市不能挤农村，而要让农业，让农村。”任何时候“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陈云文选》第3卷，第33、34、55、163、164、236页）陈云认为，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

市场紧。“无农不稳”，“无粮则乱”。农业发展不起来，工业就很难发展。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

（七）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要走一步看一步，随时总结经验。陈云长期从事经济建设的领导工作，从他的切身体验中最早认识到市场和市场调节的重要作用。早在1956年，陈云在党的八大上就提出了“三为主、三为辅”主张，其中就包括了市场调节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初，即1979年3月8日，他又写了《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阐明了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基本思想。陈云认为，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都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而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要有市场调节这一条。忽视市场和价值规律，不是企业家办经济。打破闭关自守的政策是正确的，借些不吃亏的外债和引进有利的技术是必要的。现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其意义不亚于五十年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八）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陈云认为，

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么，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要进行必要的国家干预。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财力。

陈云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观点，反映了他对党的建设规律特别是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主要有：

（一）党的建设包括党的组织工作，要适合政治路线的要求、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执行。延

安时期，中组部无论是抓干部的培养选拔、管理监督，抓各级领导班子的配备和思想政治建设、作风建设，还是抓党员发展和管理教育，抓各级党组织的组建、调整，都贯穿了党的政治路线的要求，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陈云认为，党的建设既要正确了解党的政治路线，又要切实了解具体情况，避免“空谈”和“盲目”。

（二）选拔干部要德才并重，以德为主。陈云坚持了党的干部路线，丰富了党的干部政策。他强调，选拔任用干部要以德才兼备为标准，更要注重于德，要确实提拔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要注意五湖四海。他强调，要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干部。领导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较早地提出了培养选拔接班人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多次强调要成千上万地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参与制定了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经过全党的努力，干部队伍新老交替已形成制度。陈云认为，我们用干部要五湖四海，再加一个德才兼备，这是提拔干部的大方针。延安时期，陈云明确地提

出了挑选干部的四条标准：一是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忠实于党；二是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三是能独立决定工作方向并负起责任；四是守纪律。并指出，才，不是空才；德，不是空德。考察一个干部的才和德，主要应看其在完成任务中的表现。后来他又提出：用干部的标准，概括起来有二：政治，能力。两者不能缺一，以政治为主；德才兼备，以德为主；使用人才的原则，是用人唯贤。他明确提出：要严格把好政治标准这一关。德才相比，我们要更侧重于德，就是说，要确实提拔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

（三）干部政策，就是用人之道，要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陈云认为，善用各种人才，才能成大事业。陈云把了解干部放在干部工作的首位。指出：“一个人的长处里同时也包括某些缺点，短处里同时也含着某些优点。用人就是用他的长处，使他的长处得到发展，短处得到克服。天下没有一个人是毫无长处、毫无优点的，也没有一个人是毫无短处、毫无缺点的，所以我们说，在革命队伍里，无一人不可用。”（《陈云

文选》第1卷，第111页）陈云经常讲：中央组织部不是法院，不是检察院，我们要使用干部，要发挥干部的长处，就要发现干部的长处。看一个人，要看他的长处，看他的优点，看他的主流。陈云以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胸怀提出“广招天下士，诚纳四海人”。针对有的同志容不得人，喜欢简单，不喜欢复杂。他指出：要干大事情，就免不了要遇到复杂情况。只有几个人，不要发展，才简单，但是革命一定不会成功。共产党是先锋队，要领导广大后备军，要与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它周围必然是复杂的。因此，还是复杂一点好，还是“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好，这样有利于团结更多的同志，革命才能成功。

（四）各级领导班子都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制度。陈云高度重视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他多次强调，只有通气，才能团结，只有民主，才能集中。要照党章办事，不要一个人说了算。民主革命时期，陈云就精辟指出：“不民主，只集中，必然愈不能集中；多交换意见，反而容易集中。”（《陈云文选》第1卷，第

347、348 页) 1980 年 2 月, 陈云提出: “要真实行集体领导制度。民主集中制, 是既要民主, 又要集中。党的任何一级组织, 允许不同意见存在, 我看这不是坏事。有不同意见, 大家可以谨慎一些, 把事情办得更合理一些。允许不同意见的辩论, 这样可以少犯错误。一个人说了算, 一言堂, 一边倒, 我认为不好。” (《陈云文选》第 3 卷, 第 270 页) 1985 年, 他强调: “重大问题的决定, 必须经过集体的充分讨论。” (《陈云文选》第 3 卷, 第 353 页)

(五) 支部是党的最基本的组织, 是党的力量增长的主要源泉。陈云强调支部不但要在组织上具有核心堡垒的形式, 而且要在实质上真正能起核心堡垒的作用, 为建设、巩固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提供了有力的指导。陈云指出, 支部是党的最基本的组织, 是党团结群众的核心组织, 是党的力量增长的主要源泉。如果没有党的支部这一基层组织把全体党员组织起来, 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 党的领导就无法落实, 就不能形成全党的统一行动。党的一切口号、主张、政策, 依靠支部才能具体深入到党员和群众中去。他强调,

要加强支部在群众中的工作，经常了解群众的情绪、群众的呼声，帮助群众解决问题。支部在周围群众中间工作的好坏，是测量支部工作好坏的尺度，一切脱离群众的支部，都是最不巩固的支部。只有党与群众密切联系着，只有党的支部真正成为群众核心的时候，党才是一个巩固的党，支部才是党在群众中的堡垒。陈云要求，各级党委要培养好支部干部，加强对支部的领导，巩固党的基层组织。

（六）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陈云强调提高党员素质，发挥党员作用在党的建设中占有头等重要的位置，为加强党员队伍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陈云鲜明地提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由无产阶级中觉悟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必须经常有系统地注意调剂自己党员的成分，并有计划地做好教育党员的工作。他强调，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并针对抗日战争初期各地大量发展党员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了放慢发展速度、边巩固边发展、以教育提高为主的发展党员的方针。陈云一贯重视从思想上建设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共产党员的六条标

准。他强调：共产党员要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党员对党要忠实，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陈云认为，要坚持共产党员的条件和标准。共产党员时刻不要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要站稳党的立场。谁要是丧失了革命的和党的立场，谁就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资格。

（七）严守党的纪律。早在革命战争年代，陈云就十分重视维护党的纪律。改革开放以后，针对党内存在的问题，他指出：“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第275页）纪律，是保证党的意志、行动统一的重要武器，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他强调，从严执纪是端正党风的有效手段，全党必须狠刹不正之风，坚决制止各种违法乱纪行为；对严重经济犯罪分子，要加大力度，从严惩办。同时他认为，对党员、干部既要严格要求，又要关心爱护。要加强教育，提高素质，拒腐防变。陈云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是一个最有纪律的党，如果没有铁的纪律就不能巩固自己。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我们党的铁的纪律。

党内不允许有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组织”。

(八)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这是陈云在1980年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在总结我们党30年执政经验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执政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这一重要论断，把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提到了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深刻揭示了新时期加强党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对于全党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为加强党风建设，他要求各级党组织和纪律检查机关把加强党性教育和纪律教育作为党的建设的一个根本问题来抓，使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地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努力从根本上克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陈云认为，执政条件下加强党风建设的重点是解决以权谋私问题。端正党风必须坚持从严治党，关键是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九) 党的纪检工作要为改革和发展的大局服务。陈云认为，党的纪律是促进改革和发展的

重要保证。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要围绕改革发展的大局。只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才能从根本上为党风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供有利条件。

实事求是哲学是中华民族哲学，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科学阐释，赋予其以鲜明的时代意义和深刻的理论意义，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最简明的表述。邓小平在新时期恢复、坚持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江泽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进一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胡锦涛在十六大以后提出求真务实，继续坚持和发展党的思想路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历史进程，如果从理论上来总结，归根到底，是实事求是哲学的伟大胜利。陈云对坚持和发展党的思想路线，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我们党内，陈云是注重思想方法的典范。

毛泽东曾几次谈到陈云。1950年毛泽东高度评价新中国成立初期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斗争，称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并极为称道陈云的理财能力，他说：“陈云有这样的能力，我在延安时期还没有看得出来，可称之为能。”（称之为能，见《前出师表》：“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1956年9月，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上，在介绍党中央副主席人选时，毛主席说：“至于陈云，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行。”（《陈云年谱》中卷，第331页）1959年4月，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期间，毛主席提出，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进。他表扬陈云，“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里”。

陈云一贯强调正确的思想方法对于做好各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他在党内多次谈过，毛主席三次给他谈学哲学。第一次，陈云说自己过去犯

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说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第二次，毛主席还是说犯错误原因在于思想方法不对头，并以张国焘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第三次，毛主席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陈云在延安阅读了毛主席写的大量手稿，得出的结论是四个字：“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最好概括，也是对党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的最好概括。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作为一条基本线索，贯穿在陈云的全部实践和全部著作中，他专门谈思想方法的著作就有多篇，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

一是延安时期。如 1940 年 12 月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谈《学会领导方法》，1945 年 5 月在党的七大上谈《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1947 年 2 月在中央辽东分局会议上谈《怎样才能少犯错误》。

二是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如 1957 年 1 月在商业部党组会议上谈《要把思想方法搞对头》，1962 年 2 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

三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如 1987 年 7 月同

中央负责同志谈《身负重任和学习哲学》，1990年1月与浙江省负责同志谈《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等。

陈云关于思想方法的一系列论述，丰富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哲学，是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运用。陈云思想方法的精髓，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是讲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讲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这十五个字，陈云讲了一生，做了一生。

（一）不唯上。陈云说：“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陈云文选》第3卷，第371页）他强调，一个共产党员，他的责任在于坚决地执行决议，在实际工作中实现这些决议。共产党员不仅在日常工作中要忠实于党的决议，而且要在困难中，在生死关头时，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决议；不仅在有党监督时，而且要在没有党监督时，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决议；不仅在胜利时，而且要在失败时坚持执行党的决议。必须以大无畏的、百折不挠的精神去克服工作中的困难，在工作中萎靡不振和用雇佣劳动的态度来对付党的工

作，是绝对不允许的。如何做到“不唯上”？陈云认为，要讲真理。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应该怎样就怎样。怎样对老百姓有利，怎样对革命有利，就怎样办。

（二）不唯书。陈云认为，“不唯书”，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不读书，不学习理论，就会在复杂的、不断变化的革命环境中迷失道路，找不到方向，不能独立工作，也不能正确地实现党的任务和决定。领导干部不要怕犯教条主义错误而不敢读书，我们的毛病是马列主义不够。要读懂马列主义，还要学一般知识。他曾题写一副对联：有关家国书常读，无益身心事莫为。他特别强调学哲学，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思想上的基本建设。管一切东西的是哲学。他主张，学习的主要方法是自修，是上毛主席讲的“长期大学”，靠在工作中学习，这是最靠得住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随时随地在工作中学习理论和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增进革命知识，培养政治远见。他认为，读书不能懒惰。要善于在繁忙的实际工作中，自己争取时间去学习。他反对那

种“自高自大”、“自称高明”的倾向，反对那种不愿学习或者对学习没有信心的现象。他强调，学习是一个长时间的问题，要做长时间的打算。读书不能求快。要订出一个切实的读书计划，照着去办，坚持不懈。他特别强调读书要善于思考。他常使用的一对镇纸上面刻的是：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

陈云认为，真正的理论，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逐渐深刻地领会，因为理论是实际的反映，归根到底是来自实际，而不是来自书本。理论和实际两者不可或缺。看不见理论和实际统一，或者看不见理论和实际有别，都不对。只停于实际，就不会有远大眼光；只停于高远理论，就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陈云提出，一个没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如果不到工作中取得实际经验，单靠听讲看书，甚至饱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想在政治上真正开展是不可能的。政治上开展的最基本的东西，是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没有实际经验，就没有政治上开展的基础。如何将书本上的东西与实际相结合？陈云强调，首先是要读懂，读懂就是消化。如果书没有读懂，就不

要急于去“联系实际”。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原理和思想方法，就会自然地把所学同自己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把具体经验提高到一般理论，并用以指导实际工作。

（三）只唯实。陈云认为，“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才是最靠得住的。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他认为，过去我们犯错误，不是对实际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只是了解的情况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误把局部当成了全面。我们要决定政策，就要研究情况，用脑筋去想问题，如果自己脑子里所想的是主观主义的，和实际情况不符，那就会犯错误。创造性必须和实事求是相结合，否则就会华而不实，不能真正地前进。

（四）交换。陈云认为，事物是很复杂的，要想得到比较全面的正确的了解，那就必须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多和别人交换意见。交换的目的，就是要互相交换正反两面的意见，了解事物

的全面情况，使自己对事物认识得更加完整。通过交换，本来是片面的看法，就可以逐渐全面起来；本来不太清楚的事物，就可以逐渐明白起来；本来意见有分歧的问题，就可以逐渐一致起来。在交换意见时，对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绝不要生气。他们的意见，对的或者错的，都有益处。对于正确的反对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足。对于不正确的反对意见，我们要把它驳倒。愈是不正确的，就愈要把它驳得彻底。通过批驳，可以加深我们的认识。正确的意见往往就是系统地驳倒不正确的意见而产生的。如果没有反对意见，可以作点假设，从反面和各个侧面来考虑问题，并且研究各种条件和可能性。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讲话。如果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

（五）比较。陈云认为，不经过比较，就看不清事物的发展程度，看不清事物的要害和本质。比较，是为了更深刻地判断事物的性质，弄清事物的本质。所有正确的分析，都是经过比较的。决定政策，组织实施，要做出几个比较方案，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不要只

提一个方案。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比较时要上下、左右进行比较，不但要和现行的作比较，和过去的作比较，还要和外国的作比较。多方面的比较，可以把情况弄得更清楚，判断得更准确。多比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六）反复。陈云认为，人们认识事物，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需要有一个反复的过程。对于有些问题的决定，当时看来是正确的，但是过了一个时期就可能发现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最好过一段时间再看看，然后再作出决定。有些问题，没有把握宁可慢些，多考虑一下，其缺点是慢。但如果错了，那就是失。慢和失比较起来，慢比失要好。如何做到反复？陈云强调，首先要在决定了对策之后，再找反对的意见攻一攻，要请人唱“对台戏”，没有“反对派”，也要假定一个“反对派”，使认识更正确。而最要紧的，是在实践过程中反复认识。凡是正确的，就坚持和发展。如果发现缺点就加以弥补，发现错误就立即改正。反复不是反复无常、朝令夕改，而是要通过判断、行动，再

认识、再修正，使认识和决策更加准确，不犯大的错误。

陈云对领导方法、工作方法也有许多独创性的贡献。主要有：

（一）做工作，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陈云，特别是他，懂得较多。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就不讲话。陈云强调：“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陈云文选》第3卷，第46页）陈云特别重视调查研究、善于调查研究，反对虚夸浮躁、急功近利。陈云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他总是强调：“解决群众切身问题的办法，必须在群众中去讨论，到群众中去找寻。”“充分发动群众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关键。”（《陈云文选》第1卷，第169、162页）陈云坚持发扬民主作风，十分注重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他调查研究的方法：一是派一些地位不高、知名度

不大的身边工作人员下去调查，这样的同志容易接近群众，便于了解实情；二是请人上来，多找一些在第一线负责具体工作的同志进行小范围交谈，这样可使调查对象打消顾虑，讲出实情，也便于对各种意见进行比较；三是广交知心朋友，特别是在基层群众中交朋友，这些人没有“乌纱帽”问题，敢讲真话；四是必要时亲自下去。他认为，其他所有形式的调查都不能代替领导干部亲自深入基层搞调查。新中国成立前夕，直到改革开放，陈云在各个历史时期，亲自进行了至少10次重要的调查研究。

第一次，1949年7月至8月，到上海主持召开上海财经会议，研究当时上海和全国财政经济困难的对策。

第二次，1949年11月，组织中央财经工作委员会所属各部，召开了20多次专业会议，摸清了全国农业、工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的情况。

第三次，1951年3月，到武汉调查商品流通情况，重点了解了人民需要哪些工业品，交通运输对商品流通的影响。

第四次，1955年1月和5月，两次到上海青浦县调查粮食统购统销问题，形成了定产、定购、定销的政策思路。

第五次，1960年冬，到上海、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调查解决国民经济发展问题，摸清了工业困难、粮食紧缺、经济失衡等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进口粮食、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工业支援农业、发展化肥工业等政策主张。

第六次，1961年3月至4月，在北京、杭州、南京等地召开关于加速发展化肥工业的座谈会，推动了化肥工业的发展。

第七次，1961年6月至7月，到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调查母猪私养、种双季稻还是种蚕豆和单季稻、农民自留地等问题，向中央写了调查报告，对于纠正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消极影响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八次，1961年10月至12月，先后主持了煤炭工业座谈会和12次冶金工业座谈会，初步摸清了煤炭和冶金工业的具体情况，并提出了解决建议。

第九次，1973年至1974年，受周恩来委

托，到广州等地调查和研究外贸问题。

第十次，1979年5月，针对上海宝钢建设中存在的不同意见，到上海召集冶金专家座谈，作出了“宝钢建设是四化建设的一个大项目，上了马就要干到底，只能干好，不能干坏，要把先进技术学到手”的论断。

（二）办事情，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积极稳妥。早在延安时期，陈云就定下了坚持、沉着、切实、前进的办事原则。他认为领导要区别工作缓急主次，掌好舵，指出主要努力方向，预防某种偏向。他部署工作总要反复考虑，看准情况，经过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稳扎稳打。陈云处理的多是党和国家的大事，有紧急的事、难办的事、棘手的事，他都冷静对待，权衡利弊，慎重决策，力求稳妥。他从不感情用事，从不草率从事，从不存侥幸心理。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他又及时指出，我们的建设和改革，任务艰巨，问题复杂，而我们的本领还不大，要“摸着石头过河”，小心谨慎地前进，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宁可稳当一些，不要冒冒失失。慎重一点，看得准一点，解决得好一点，比轻举妄动、

早动乱动好得多。

(三) 处理问题，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抓住重点。陈云说过，做大事都是从做小事开始的。不忘记经常工作，但必须抓住中心，防止事务主义，乱无头绪。他认为，工作不抓住要点，乱钻，那是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陈云抓工作卓有成效，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能够敏锐地抓住中心问题、重点问题和关键环节，并且抓住不放，一抓到底。

(四) 注意思考关系全局和长远的战略性问题。陈云经常说，做工作要有战略眼光，要拿出一定时间“踱方步”。踱方步，深思考，不仅要有看和听的时间，还要有想的时间。应该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要上屋顶，不要老待在地下室。对于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他有一句名言，全局在，可以挽救局部；而全局垮，则局部不能挽回。他认为，上层机构要有专人考虑大问题，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要有这样的战略家。他认为，对于领导者特别是各个部门、各个地方的主要领导者来说，做好日常工作很重要，专心思考和研究战略性问题也很重要，而且更加重要。越

是责任大、任务重，越要从大的方面看问题，保持头脑清醒。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见事及时，从容应对前进道路上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和风险。

（五）注意总结经验。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云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他说，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于我们党的身上，我们有这样的责任，不能搞坏，搞坏了不是一个、几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全国人民的得失。陈云勤于思考，崇尚实干，既不墨守成规，也不随波逐流，总是创造性地提出开展工作的思路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强调，工作要从一点一滴做起，踏踏实实，不能有侥幸心理，不能希望一蹴而就；工作一件一件来，每件工作做到底，就是最有成效、最快速度。他认为，新发展要从旧阵地出发。根据过去的经验，找出新的办法，这项工作比日常的业务工作更重要。他做任何工作总是注意及时总结经验，在总结经验中不断开拓创新。他认为，要找出一套新办法，就要研究过去的办法。总结经验就可以把过去做对了的和做错了的加以分析，把工作提高一步。他强调，改革开放要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以把改革搞得更好。

陈云具有坚定信念、坚强党性、伟大人格和高尚境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精神财富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历来讲修、齐、治、平。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更加注重榜样作用、表率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陈云在 70 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实现了治党、治国、治家、修身的有机结合和完美统一。

陈云多次说，我参加革命几十年，从没有停止过学习。陈云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要学习，只有多学习，才能有进步。要多读书，多学文化，多学有用的东西。学习语文、政治、数学、史地，还远远不够，要学社会学、经济学，要了解社会，了解世界。陈云自幼家境贫寒，年仅四岁就父母双亡，在舅舅抚养照顾下，只读到高小毕业，就因再无力交付学费而被迫辍学。因此，他非常渴望学习，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无论斗争环境多么险恶，工作怎样繁忙，他都始终坚持学习。勤奋学习，成为陈云最重要的品格之一。

陈云认为，学习非常重要，是做好工作的前

提条件。他说：“学习是做好工作的一个条件，而且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因为“共产党员有了革命的理论，才能从复杂万分的事情中弄出一个头绪，从不断变化的运动中找出一个方向来，才能把革命的工作做好。不然，就会在复杂的、不断变化的革命环境中，迷失道路，找不到方向，不能独立工作，也不能正确地实现党的任务和决定。所以每个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在工作中学习理论和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增进革命知识，培养政治远见。”（《陈云文选》第1卷，第188、142页）

陈云强调，学习最重要的是学习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好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指出：“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陈云文选》第3卷，第360、362页）

陈云认为，党的高级干部应该成为学习的模范。陈云指出：“党内的老干部、高级干部首先要努力学习，成为学习的模范。因为你是老干

部，因为你常常担负独当一面的领导工作，你就更有责任而且更有必要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陈云文选》第1卷，第188页）

陈云学习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深思，从来不生吞活剥，不死记硬背，而是联系实际，力求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抓住最核心、最基本、最本质的东西，并且善于用自己的话把它表达出来。例如，他在延安把毛泽东起草的电报、文件都认真读了一遍，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要实事求是。然后，他又通过学习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哲学著作，深入思索如何才能做到实事求是的问题，概括出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思想方法和工作原则。

陈云学习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一以贯之，终生不渝。“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受到严重冲击，一度被迫离开北京到江西“蹲点”，这反而给他提供了又一个极好的读书学习机会。他每天上午去住所附近的石油化工机械厂参加工人的班组会，下午和晚上则在住所读书。这段时间，他给自己制订了一个读书计划，重新阅读《马恩选集》、《资本论》、《列宁选集》、《斯大

林选集》、《毛泽东选集》等经典著作，特别是列宁在1917年2月革命后一直到逝世前写的《列宁全集》各卷，并用钢笔和不同颜色的铅笔在上面画了大量的道道、杠杠、圈圈，还写下了许多批注。他说：“不读不行啊！‘老祖宗’还是管用的！”（沈鸿：《哲人其萎，风范犹存》，《人民日报》1997年6月13日）

1972年4月，陈云回到北京。不久，中央决定让他参加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协助周恩来抓外贸。由于时间比较宽松，陈云又给自己订了一个读书计划，打算用两年时间再精读一遍《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若干著作。他不仅自己读，还把家里成员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学习小组。首先学习的著作是毛泽东的《实践论》，学习的方法是每人先分头自己阅读，然后每星期天早上6点半到9点半集中在一起讨论，提出疑问，交流学习心得。

1981年，中央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去看望陈云。陈云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提高工作方

法、思想方法。邓小平很重视陈云这个意见，立即转告起草小组负责同志，指示他们在决议中要把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

陈云关于学习的重要论述和终生学习的实践，给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真理：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和人口众多的民族，如果没有科学理论的武装和对各种知识的掌握，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腾飞，不可能有现代化的前途。学习问题，关系到广大干部的成长进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兴衰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

陈云是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典范。他认为，共产党员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坚定对党的信念，这是共产党员的第一条标准，他指出：“共产党是为人类的彻底解放，为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因此，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每一个党员应该深刻知道中国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艰

苦的斗争过程，在弯曲险峻的革命道路上，革命者必须经历长期的艰苦和波折；在与敌人经常的斗争中，在每一事件的紧急关头，还有牺牲的可能。因此，每个共产党员不仅要坚信共产主义必然实现，而且必须对于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有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和奋斗到底的决心。”（《陈云文选》第1卷，第137、138页）他说：“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的事业。”（《陈云文选》第3卷，第347页）陈云在一次谈到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运用时说过：“有了坚定的立场，才能掌握这个方法。如果尽是为了个人打算，一辈子也掌握不了这个方法。个人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就在这里。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大家如果都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方法就容易一致，对问题的看法就容易一致，事情就好办了。党内只应当有这种态度，这就是共产党员的态度。”（《陈云文选》第1卷，第346页）无论斗争如何艰巨、情况怎样复杂，无论是顺境还是逆

境，陈云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坚贞不渝，表现出共产党人不可动摇的意志和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

陈云是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的典范。他认为，“要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陈云文选》第3卷，第274页）他从不讲假话，即使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也敢于坚持真理，坚持正确意见，并顾全大局，维护团结，按组织渠道陈述和坚持自己的意见。在延安整风期间，他不同意康生把大批干部打成敌特分子的“挽救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他领导经济工作一贯坚持“基本建设要与国力相适应”，“要重视人民生活”，反对不切实际的高速度、高指标和浮夸风；粉碎“四人帮”以后，在“两个凡是”还没有冲破之时，他就力主纠正天安门事件等重大冤假错案，提议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他从不讲空话，从不发表空泛的议论，每讲一个问题，必定经过深入调查和周密思考，算大账高瞻远瞩，

算小账明察秋毫。他从不讲套话，他的风格历来是开门见山，一针见血，简练明了，不落俗套。他一生无私无畏，秉公行事，从不计较个人进退得失，为维护人民的利益和真理的尊严，在关键时刻敢于直言直陈，甚至宁肯沉默也不讲违心的话。1985年6月，陈云曾经谈了对坚持原则的一些看法。他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肯讲，在陕西组的会上讲了“交换、比较、反复”。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也是顶的，讲了彭德怀的问题，超出了当时华国锋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得超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界限。以后，审判“四人帮”，政治局开会讨论，许多同志主张江青判死刑。我说不能杀，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说，党内斗争也可以杀。我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总之，我是一方面小心谨慎，一方面又很硬。他认为坚持原则，同遵守纪律是统一的，提出了“坚定的革命者视纪律为自由”的重要观点。他用生动的比喻说明，“真正的游泳家在水里是自由的，真正的革命家，在有纪律的革命运动里，也是自由的。”

（《陈云文选》第1卷，第276页）他强调，要真心地、具体地遵守党的纪律。真心地遵守，就是要心口一致，言行一致。具体地遵守，就是要在各种具体的情形下遵守纪律，“具体地遵守纪律，就一定要服从支部，服从直接的上级，即使上级的人比你弱，你也一定要服从。”（《陈云文选》第1卷，第277页）陈云说：“我们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是什么就是什么，应该怎样就怎样。”“共产党员参加革命，丢了一切，准备牺牲性命干革命，还计较什么面子？把面子丢开，讲真理，怎样对于革命有利，就怎样办。我们肩头担负这样重的任务，如果强调讲面子，在讨论问题时，就会不客观。”“如果一切从自己面子的角度出发，讨论问题、看问题掺杂个人得失在里面，立场不正，就不会看得很清楚，不会讲真理，结果一定是害人害己。犯错误就是把客观看错了，结果也错了。”（《陈云文选》第1卷，第296页）

陈云是爱民为民、求真务实的典范。他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是历史的真正英雄。只有获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革命和建设才

能够成功。他认为，群众观点是立党的根本，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群众的实践是我们党的认识 and 智慧的源泉。有了问题要和群众商量，在群众中去讨论，到群众中寻找，只有到群众中才能找到解决问题最适当的办法。他认为，离开群众是没有什么诸葛亮的。共产党员要有为人民群众“当差”的思想。所谓“当差”，就是为老百姓做事情，为人民群众服务。人们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是否对人民尽到了责任，可以考验谁是优秀子孙，谁是不肖子孙。陈云认为，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和民族振兴，必须同群众同甘共苦，无论是谁，都是“群众一级的干部”，永远是群众中的一员，如果党脱离了群众，就有灭亡的危险。陈云始终认为，经济工作应首先考虑民生。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工作的着眼点要先放在哪里？陈云指出：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他说，建国快30年了，现在有些农民还吃不饱饭，再过一二十年，若还是这个样子，就交代不过去。

陈云十分关心、爱护干部。他说：“当着解

决一个干部的问题，关系到他的政治生命的时候，要很郑重、很谨慎、很细心地去处理它。一个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志，往往对肉体生命并不重视，对于政治生命非常重视，他宁愿牺牲一切，也不愿意被党组织开除。如果政治上发生这种问题，他就会认为他的前途没有希望了。”“做父母的爱护他们的子女是非常周到的，但是共产党爱护党员也并不亚于父母爱护子女。任何一个人犯了错误，都应该帮助他纠正”。“上级领导人对下级的批评，务必要适当和正确，千万不要戴大帽子。”（《陈云文选》第1卷，第120、121、117页）

陈云性格内向深沉，却充满爱心。张庭春是陈云的警卫，家里经济条件一直不宽裕。1995年初，张庭春因病去世时，家中的孩子又生病住进了医院。了解到这个情况时，陈云正在医院住院治疗。在他病情恶化、生命垂危的最后日子里，仍然惦记着这件事，并告诉他的夫人于若木要解决好。陈云逝世后，遵照他的遗愿，于若木从他的稿费中拿出两万元，责成身边工作人员谢国富到张庭春家中进行慰问。当谢国富讲明了来

意，把两万元送到张庭春妻子手中时，在场的每一个人，无不被陈云关心下属、热心助人的崇高品质感动得热泪盈眶。

陈云是谦虚谨慎、淡泊名利的典范。陈云一生谨慎、自律极严。不居功，不自恃。闻胜不骄，遇挫不丧。他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卓越贡献，但从来都把一切功劳归于党和人民。他说：“一个人最愉快的事，就是参加革命，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陈云文选》第2卷，第27页）“假设你在党的领导下做一点工作，做得还不错，对这个功劳怎样看法？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可不可以把次序倒转一下，第一是个人，第二是党，第三是老百姓？我说不能这样看。”（《陈云文选》第1卷，第293页）要深刻认识到，“个人的作用是有的，不过自己不要估计得太大了。任何人离开了人民，离开了党，一件事也做不出来。”（《陈云文选》第1卷，第295页）他说：“我们是党员，在党的领导下，适合老百姓的要求，做了一点事，如此而已，一点不能骄傲。”（《陈云文选》第1卷，第296页）

陈云还讲过：“人们常常容易在胜利时因疏忽、骄傲而犯错误。”“一个人在人家鼓掌时，他可以有两种态度，一是小心谨慎，一是昏头昏脑。昏头昏脑就很可能是跌跟头的候补者。”（《陈云文选》第2卷，第138、234页）陈云生活十分俭朴，吃的、穿的、用的都很简单。两袖清风，一尘不染。不收礼、不吃请，是他一生遵守的规矩。八大之前，陈云已是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之一。八大后，陈云是中共中央四位副主席、六位常委之一。但是，陈云始终要求有关部门在待遇上、宣传上不要把他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并列。苏联政府赠送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一人一辆汽车，陈云坚持把给他的那辆汽车退给有关部门。实行工资制，有关部门给五大书记定为一级，陈云把自己改为二级。八大之后，《红旗飘飘》丛书要给每位中央政治局常委都登一个小传，陈云始终不同意登他的小传。他经常写的一个条幅是：“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这是陈云伟大人格的真实写照。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现实之中，但多数人将成为过去，只有少数人可以走进历史，而真正属于未来的人则寥若星辰。实践和时间，检验和证明一切。陈云是属于未来的人。

当代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重而道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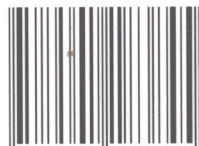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宝贵的实践财富、理论财富和精神财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局面，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未来属于伟大的中华民族！

责任编辑 刘 飞

封面设计 王晓明

ISBN 978-7-5011-8384-5



9 787501 183845 >

定价：12.00 元